

·文 学·

中国翻译史上的破天荒之作

——读季羨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郁龙余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吐火罗文是中国新疆古代的一种文字, 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弥勒信仰是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新博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出土, 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季羨林是我国目前唯一通晓吐火罗文的学者, 他在耄耋之年前后花十余载时间翻译研究, 写成中英文合本体《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 代表了国际吐火罗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 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巨大荣誉。

[关键词] 吐火罗文 弥勒 研究

[中图分类号] 1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1) 02- 0006- 04

《弥勒会见记》译释, 是季羨林先生晚年的一项重大翻译研究工程, 历时之久, 用力之勤, 不亚于翻译大史诗《罗摩衍那》。吐火罗文是在我国新疆境内发现的一种古文字, 分 A、B 两种, 出土于焉耆县的, 称吐火罗文 A, 又称焉耆文; 出土于龟兹县的, 称吐火罗文 B, 又称龟兹文。世界上通晓吐火罗文者, 极为珍稀, 所以吐火罗文可以说几成绝学。先生是国内唯一真正掌握这门几成绝学之人。他自 1946 年回国之后, 由于资料完全缺乏, 再也没有机会研究。然而, 到了他的晚年, 44 张 88 页吐火罗文残卷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知道翻译研究这些残卷难度巨大。接还是不接, 进退两难。最后, 先生以巨大的学术勇气, “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下来”。于是, 当代中国翻译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1998 年在柏林和纽约出版了研究《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英文专著, 同年在中国

作为《季羨林文集》第十一集出版了中英文合体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在这个合本体中, 收录了先生研究吐火罗文 A 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 N 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和中文的长篇《导言》。

先生在耄耋之年, 胜利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首先, 先生捡起丢了 40 多年的吐火罗文。他找出从德国带回来的尘封已久的吐火罗文书籍, 绞尽脑汁, 把当年获得的那一点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 刮垢磨光, 使之重现光彩。^①他将婆罗米字母转写成拉丁字母, 转写了不到几页, 《弥勒会见记剧本》的书名便赫然在目, 顿时使先生喜不自胜。其二, 得到了回鹘文译本的相辅。吐火罗文残卷是 27 幕《弥勒会见记》剧本中的一部分, 而这个残本由于被火烧过, 没有一页甚

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然而十分幸运，这个剧本在中国新疆出土了丰富的回鹘文残卷，而中国有回鹘文专家。先生像得到了一根拐棍。在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李经纬等教授的帮助下，先生逐渐弄清楚了吐火罗文残卷的内容。这是一件十分费时费力的困难之事，他在《自序》中说：“我只能靠着西克师有名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艰难困苦地向前爬行。”^②有没有回鹘文的相辅，是很不一样的。在德国，早已由 Sieg 和 Siegling 将保存在欧洲的中国新疆出土的《弥勒会见记》的原文及由他们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本子出版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译释出版过。因为欧洲学者缺乏一种必要的辅助。先生则有这种辅助，他说：“对照汉文有关资料，其中最为重要者实为回鹘文译本，若无回鹘文译本，则翻译吐火罗文本，几为不可能之事。”^③其三，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帮助。先生用十几年的时间，先后译释了若干篇章，用中英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于是引起国外专家的重视，德国吐火罗文专家 W·Winter 教授要求先生将这个剧本残卷全部译成外文在欧洲发表。于是，先生在得到中国回鹘文专家帮助的同时又得到德国吐火罗文专家 W·Winter 和法国吐火罗文专家 G·Pinault 教授的大力支持。先生在案语中说：“现在这个英译本，虽为破天荒之作，倘无上举德法两位专家学者之鼓励，之帮助，则必不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此可断言也。”^④

以上三个条件合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中英文合体本。说其是奇迹，是破天荒之作，是中外翻译史上的幸事，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而这个成果是他在耄耋之年取得的，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那么，《弥勒会见记》译释到底有何重大意义呢？这部著作的意义有两部分，一是其内在的学术意义，二是其外在的影响意义。

先生对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研究的学术意义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搞清楚了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性质。

此书在典籍中无记载，故在新疆残卷第一次发现之前，谁也不知道有这部书。残卷的出现，学者们大为震惊。但由于残缺，学者们都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后来，有学者通过研究，渐渐知道这是一部佛经，是一部文学作品。经过季先生的译释，则比较彻底地弄清楚了这部书的真面目。

(一)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译本，它的原文是印度文，可能是梵文，也可能是印度其他俗语。由于迄今在印度尚未发现原文，这就为不善保存古籍的印度增添了一份文学遗产。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是根据吐火罗文本译出的。先生认真将这两个本子进行核对，发现两者“虽然在不少地方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几乎是字与字句与句都能对得上的。称之为翻译完全符合实际情况。”^⑤这样，不但为印度戏剧史和中亚佛教传播史填补了一个空白，而且进一步确定了吐火罗文的历史地位和《弥勒会见记》在中亚的两个译本之间的关系。

(二) 确定《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由于这个译本颇为特殊，戏剧的特征十分模糊，使得西方学者包括 Sieg 和 Siegling 在内也都否认它是一个剧本。他们说：“从内容上来看，这部作品一点也不给人戏剧的印象。它同其他散文夹诗的叙事文章一点也没有区别。”^⑥约 31 年后，Sieg 教授承认《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但是怀疑、争议在西方学者中依然存在。先生经过译释，特别是将此剧的吐火罗文本和回鹘文本加以对照，确认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先生明确指出，吐火罗文剧本无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技巧方面，都与欧洲的剧本不同。带着欧洲的眼光来看吐火罗剧必然格格不入。当然，这个吐火罗文剧本严格说来，是一个羽毛还没有完全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⑦先生的这个结论，不仅廓清了西方学者对此剧的怀疑，而且为我们指证了一个在文化交流中尚未完全成熟、定型

的戏剧样式。这对研究东西方戏剧差异及戏剧在翻译传播过程因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第二,搞清楚了《弥勒会见记》的版本情况。

先生译释的残卷从新疆焉耆县出土,并由新疆博物馆收藏,所以先生名之为“新博本”。新博本内容相对集中,大都在27幕剧的第一、二、三、五四幕。虽然剧本内容不全,但意义重大。早在1983年,有专家在《文物》上刊文指出:“这次发现吐火罗文A(焉耆语)本《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为研究吐火罗语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对于我国民族史、戏剧史、宗教史等的研究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⑧

这么重要的古籍版本流传情况,先生是不会放过的。他对流存在各地的本子进行了介绍,其中对“德国本”作了重点分析,并将新博本与德国本进行了对照,使人们对两者的相互位置一目了然。另外,先生还对弥勒故事在巴利文、梵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汉文中的情况作了介绍。其中对巴利文、梵文和于阗文的材料收集尤详。先生是梵文、巴利文专家,治梵文,巴利文资料自然驾轻就熟。在此,我要强调的是于阗文资料。于阗文曾流行我国古代新疆的于阗一带,于今已与吐火罗文、回鹘文等一样,成了一种死文字。关于弥勒的资料,保存在一部因一位名叫Ysambasta的官员命人撰写因而被人称为《Ysambasta之书》的长诗中。此书共24章,其中第22章《弥勒授记经》的内容,先生根据Emmerick的英译本全文译成汉语。这样,使我们的汉文佛藏多了一份文学作品,同时为弥勒研究提供了新的极有价值的资料。^⑨先生如此看重《弥勒授记经》,是因为它的研究价值。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的导言中,先生对《弥勒授记经》和鸠摩罗什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对这个于阗本故事在新疆及中亚弥勒信仰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亦作出精辟的论述。

第三,对弥勒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弥勒是佛教中的重要菩萨。他原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后来成为佛弟子,从佛授记(预言)将继承释迦牟尼位为未来佛(“当佛”)。弥勒救世思想传入中土,与道教某些教义融合,形成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在中国民间迅速传播。所谓三佛应劫救世,简言之为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时期应世救难。而弥勒佛在未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救苦救难,度贫男贫女回归彼岸。本是大乘佛教中一派的弥勒净土信仰,不但得到中土上层社会的诚信,而且得到中土下层百姓的追捧,一时势力大增,在一段时间里几乎直追释迦。不仅翻译了大量有关弥勒的佛经,而且杜撰了许多拥戴弥勒的伪经。从造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弥勒信仰的情况。据统计,北魏时释迦造像103尊,弥勒111尊,阿弥陀15尊,观世音64尊,可见弥勒信仰之盛。从汉末到清代,弥勒救世思想在中国流传不绝,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朝廷对抗,形成了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然而,以前对弥勒信仰的研究,所据材料基本上以汉译佛经为主,对弥勒信仰在梵文、巴利文典籍中的记载以及在传播途中的有关情况,由于资料的欠缺而无从展开。

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则完全突破了这个局限。印度早期佛教中就有多数佛的概念。在巴利文佛典中,就提到了未来佛。弥勒(Metteya)这个巴利文词汇出现于巴利藏最早的经典之一Suttanipita中。佛教从小乘发展为大乘,弥勒信仰非但未受影响,而且势力愈来愈大。原因是大乘佛教冲破了小乘佛教的各种束缚,形成了“一神论思想”、“救世主思想”、“功德转让”、“在家修行”、“塑造佛像”等等众多特点,而弥勒集这些特点于一身。先生深刻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唯一的神;他在无数的菩萨中是一个特殊的菩萨;在小乘中他只是个未来佛,通过弥勒Cult他成了一个救世主;他有像;他通过自己的功德最终普渡众生,使众生皆大欢喜,来了一个最大的大团圆;他

是他力的典型代表。”^⑩这段论述，不但道出了弥勒的风云际会、扶摇直上，而且道出了佛教从小乘向大乘发展的轨迹。

总之，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特别是其中《巴利文、梵文、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一节中所论述的7个问题《巴利文和梵文中〈弥勒会见记〉与〈弥勒授记经〉的各种异本》、《Maitreya 这个字的含义》、《Maitreya 与 Ajita》、《Maitreya 与 伊朗的关系》、《Maitreya 与 Metrak》、《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发展》、《弥勒与弥陀》，充满了对弥勒研究的新突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和新论点。中外学人再要研究弥勒，应从研究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开始。

影响意义是建立在学术意义之上的。

中国进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制度衰亡，积贫积弱，大量文化古籍被盗往国外，敦煌古卷便是典型一例。于是，敦煌学研究渐渐兴起。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不管这种说法能否成

立，总是中国学者面临的尴尬。新的吐火罗文残卷出土了，送到了中国唯一懂吐火罗文的学者面前，怎么办？先生经犹豫之后最终接受了任务。此事表面上是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突然造访，将新出土的44张88页吐火罗文残卷交给了他。而我认为，这实际是一种民族的重托，尤其是当弄清了这些残卷的内容及其学术意义之后。先生在迟暮之年所以花这么多心血和时间，除了译释工作的学术意义之外，我想不会不考虑其影响意义。现在，我们看见的这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中英文合本，是当今世界对《弥勒会见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这一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我可以放言：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出在中国，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研究也在中国。先生又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巨大荣誉。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季羨林文集》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第2、3、140、140、8、8、12、15、97-111、7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董 轩

•学术动态•

英国《中国经济改革： 有关文献研究》转载我刊论文

〔本刊讯〕近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系亚洲经济学专业教授 Christopher Howe 来函，并转本刊作者蒋励先生，他和 Y. Y. Kueh 教授、R. F. Ash 教授编译的《中国经济改革：有关文献研究》（伦敦 Curzon 出版社，通过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分销）收集了本刊于1994年第4期发表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四项重大改革与启迪》（作者：蒋励）一文。据来函说，该书编译的文献主要选自1978年以来以中文形式发表的有关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编译出版该书的目的是使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改革进程而又不甚了解中国的读者，能通过该书阅读过去20年来一些最重要和最有趣的文献而有所帮助。

（韦 前）